

神廟、宗祠、社區文化

黃志繁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可能與人類學家不同，歷史學家一踏入一個陌生的社區，馬上就會問，這個社區原來是什麼樣子？有那些人到了這裏？最早的是那些人？他們做了什麼，這些又是怎樣影響了這個社區的文化等等一系列問題。在7月中旬赴江西考察過程中，我這個初學者也會追問一些這樣的問題，我也不知這樣做有沒有意義，只是有所思亦有所得，因此，在此交流一二，懇望指正。

贛州的七里鎮是座移民商鎮，這一點從它的語言可以看出。七里鎮通行的話是一種以客家話為主夾雜著官話的語言。但據了解（我曾於1997年到過七里鎮做過短暫的調查），七里鎮有一些宗族內部還保留有本族語言，只對本族人講。這些講不同語言的人是各自在什麼時候來到這裏的呢？我不通語言學，根本無從知曉。但七里鎮那十二座殘存的窯包卻告訴我們宋代此地即可能就是繁華之地。這些繁榮的造窯業在元代以後突然消失，許多人斷言是由於宋末元初的戰亂。其實，問題可能非常簡單，七里鎮的窯都是官窯，七里鎮曾出土了印有“第二務”字樣的銘文磚，既是官窯，可能由於官府需要而興起，也可能由於官方下令而廢除。一個偶然的原因，技術不行，或原料困難，就可能廢止。但官窯雖廢，人家應還在。

關於南宋恩科狀元池夢鯉的傳說，饒有趣味。村民都傳說皇帝在閱卷的頭一天晚上夢見一條金色的大鯉魚，第二天看見池夢鯉的名字，就錄取為恩科狀元。這個傳說毫無真實性，而且我在嘉靖《贛州府志》中沒有找到池夢鯉的名字，倒是天啓《贛州府志》出現了他的名字，嘉靖《贛州府志》對本地的賢人士大夫記載頗詳，連割據稱王的盧光稠也列入忠義（天啓《贛州府志》即以春秋筆法把盧光稠刪去，此事很有趣，此不贅述），恩科狀元豈會不錄？恩科狀元的傳說反映的很可能是明代宗族在社區立腳的問題，既是這樣，聯繫那十二座窯包，至少明代中期，七里鎮就有較多人在此居住，應不成問題。

另外，七里鎮三個坊都有康王廟的事實似乎提示，七里鎮的居民和南宋大移民潮有關。總

之，在明中期竹木貿易興起以前，七里鎮就可能存在一個農耕社會，康王大概就是他們的保護神。但明代中期興起的竹木貿易極大的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坐落在市集中心的萬壽宮當年無疑是恢宏壯觀的，聯想到贛南許多著名市集邊上都有萬壽宮和萬壽宮是江西會館的保護神這一事實，我們可以推斷萬壽宮和當地的商業發展有密切的關係。當然，這亦可能與水患有關。但沒有商業利潤的支持，建這樣宏大的萬壽宮，既無可能，也無必要。萬壽宮確切無疑是當地的權力中心，當地人告訴我，以前有什麼問題以及重大決定都在萬壽宮內解決，有個老人曾在我面前對解放後人民政府在萬壽宮上建貯木場表示非常氣憤。但萬壽宮是如何獲得這一權力的呢？我沒有採訪到任何故事也沒有獲得任何碑文，十分遺憾。

大家非常感興趣的仙娘廟，其實離萬壽宮較遠，仙娘廟可能是贛南現存不多的保留古代村社生活的古廟，它的餘風古韻讓人很容易想象出解放前七里鎮居民的娛樂情景。我們依然很頭疼，搞不清仙娘廟的興建年代，但我懷疑，面帶微笑的仙娘不僅可以保護小孩不出天花，而且滿足了居民們的一切願望：發財、升官、祈壽等等。仙娘廟大概是和七里鎮人最親近的神，因而娛樂色彩很濃，每年舉行廟會搭台演戲。或許當年的娛樂太過不雅，例如採茶戲之類，當地文人士大夫便建了一座文昌閣在上面，以導化風俗。但這件事是否意味著文人對社區權力的介入呢？從下文所附的材料看來，解放前，七里鎮的三個坊有一定的管理權，萬壽宮則行使著對全村的的管理，如果真是這樣，這樣的格局形成不知經歷了怎麼樣的整合過程？

流坑也是商鎮，明代中期後，長江下游竹木資源衰竭，使得長江中下游一些地區的竹木貿易非常發達，在許多河道沿岸興起大量竹木貿易商鎮，流坑就是其中之一。進入流坑，可以感受到很濃厚的科舉文化氣氛，另外流坑的宗祠之多，恐怕也是特色。那麼，董燧改造之前的流坑是什麼樣子？由於，我們現在看到的流坑是經過士大夫改造的社會，我以為，流坑的早期歷史很可能

會在一些地方文化活動中留下痕跡，例如，神秘的儺舞，難懂的神廟，但我對這些根本不懂，手上海也沒有資料，只能從整體的地域文化中去做些不成熟的探討。

流坑雖然在行政上屬於撫州，但無論從地理上還是人文上都屬於吉安。在士大夫眼中宋代的吉州是什麼樣的地方呢？北宋思想家李觀寫道“南州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賦貢與其治訟，世以爲劇，則其民眾伙可識已，雖然，吉多君子，執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跡，虔無有也”。南宋李綱則認爲“虔、吉、筠、袁等州，素產盜賊，蜂屯蟻聚，千百成群，不可勝計”。這兩條材料時間跨度太大，但吉州盛產君子，似乎也是事實。我們驅車從贛州進入吉安，要翻過幾道山，才進入吉泰盆地，景色豁然開朗。從宋代的歐陽修、文天祥到明代的解縉、楊士奇，都是這個地區的人。

吉州同樣產“盜”，我在翻閱《宋史》時也看到許多吉州“盜”的記載，尤其是象流坑這樣的山區與盆地相連部分。這裏，我不想討論流坑宋代二十多個進士的真偽問題，只想指出，宋代周必大爲董昌裔寫的墓志銘，稱董氏爲“廬陵郡著姓，儒風郁然，登科者相繼……而董氏曰洙與其子師德弟汀侄師道師儀一門五人在焉”。元代吳澄也說董氏“通撫之六族而論，仕宦之眾莫與之論”。這兩篇文章都收在他們的文集（四庫本）中，作偽的可能性較小，而他們指的是廬陵郡和撫州的董姓，也應是流坑董姓。除非宋元的董姓全滅絕，後由董燧全抄入族譜，但這種可能性也很小。那麼，發達的科舉文化和多“盜”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從吉安到流坑有那麼多武術學校？這個問題到了流坑，我們就有了答案。

流坑邊上的高低不平的山和流坑濃厚的軍事化氛圍都告訴我們，流坑人還要面對殘酷的生存環境，結族自保可能是一種生存的手段，必須注意武力自衛。而且，象流坑這樣的大宗族遍布周圍區域，我們坐車過來時，就發現很多大的聚落，以至於常常誤以爲到了流坑，這樣流坑還要面對來自其他宗族競爭，山林資源的爭奪、地域政治權力的競爭，加上周圍科舉環境的影響，考科舉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就非常重要。明代竹木貿易的興起，雖喧囂一時，但政治資源更重要，而且總體上仍受制於這樣一種文化氛圍，惟有在

這樣的基礎之上，董燧的整合才變得易於被族人接受，也就不難理解流坑那麼多宗祠表現出來的士大夫文化取向。

我很詫異董燧能在社區中做成這麼偉大的事業，江右王門學者在我研究的贛南也有兩個很突出的，可惜由於缺乏文獻，我還不知道他們在家鄉幹了什麼，我懷疑在脫離了整體的社區文化，雖有類似的生存環境，卻可能有不同的結果。

從七里鎮到流坑，我常常會想起我以前走過的贛南的村落，我總覺得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不知爲什麼，我不時有股莫名的傷感，“贛南”這個詞已經被帶上了紅色的革命色彩，而在歷史上贛南發生的許多事，卻似乎既沒有給贛南帶來歷史的輝煌，也沒有帶來今天的發達。我想，如果能在這兩個地方再找兩個村子研究，一定很有意思。我們似乎缺少對江西的一些人文發達地區（例如吉安、撫州等地）進行同樣層面上的研究，這些地區的資料相當的豐富，惟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流坑，更好地理解贛南。

附資料：以下碑文是我 1997 年在七里鎮考察時在沙中發現抄回的，估計現在已很難找到了。這個碑文放在七里鎮中坊的賴（袁）家碼頭邊上，碼頭邊上是一個開闊的用石頭堆砌的空坪，據介紹，這個空坪是用來每年燒龍船之用。中坊康王廟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鬧元宵，然後把龍船燒掉。現把碑文抄錄如下：

合坊公議

今將康王廟送送船墩堆積板木以及雜色等項貨物收納地租錢條規開列于后：

一議堆杉板每丈納地租錢拾文

一議花木每根納地租錢五文

一議連桐每根納地租錢八文

一議車桐每根納地租錢五文

一議板橋每塊納地租錢壹文

一議柴火每八納地租錢壹文

一議木□船在墩打蓬每月納租毫洋三十毫

一議禁止墩上無論大小雜木毋許堆放，如有違

反，強者公罰毫洋貳百毫

一議每逢正月不能出租，如有先放者，至期定須空開

一議統墩上租錢概規廟內福主值堂首事經理收取，他人不得冒收，其出租金者亦不得亂來

民國甲子年季冬月